

# 高考魔鬼词典

任羽中

1998年高考四川省文科第一名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 写在前面

需要预先声明的是，我不打算对高考制度本身发什么牢骚，我准备挖苦的是因为这个制度而产生的一种被异化的生活。老实说，我认为对高考的正面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举一个例子，我的舅舅李成良教授是六六级的高中生，当年连高考志愿都已经填好了，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声令下，高考取消，这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只好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舅舅种了几年地之后开始在村子里的小学教“人口手田土地”。满以为就这样扎根广阔天地一辈子了，直到小平同志复出，恢复高考，甚至把用来印《毛选》第五卷的纸拿来印试卷，才终于把一大批读书种子的希望重新点燃起来，年轻人才敢理直气壮地喊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当然这个话可能有轻视人文社会科学的嫌疑，但是我想相对“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高论”和“反潮流”的“白卷英雄”，

这种对“数理化”的自信自豪太可贵了。恢复高考后的“新三届”（1977、1978、1979 三届）大学生现在都成了各行各业的支柱，纪念恢复高考制度二十周年的时候，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他们大量的回忆文章，当时我就想：要是高考制度不恢复，我们国家现在真不知道要成什么样子！可以说，高考制度的恢复不仅改变了千千万万人个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

我还想为高考说的另外一方面的好话就是它比较公平，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用管你爸爸是省长还是农民，也不用管你长得花容月貌还是对不起观众，有什么本事在考场上凭分数说话。仔细想一想你可能说凭一次考试定终身其实很不科学，但是就我们现有的认识水平和技术条件而言，除了搞这么个考试之外，你还能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西方有些国家升大学是不用考了，因为他们的高等教育资源非常充裕，可以向所有人敞开大门。可是他们的文官考试制度却比高考制度更加严格，一定意义上讲，他们也是靠着“其实很不科学”的考试来保证社会阶层流动的公平。而在东亚，比我们富裕的日本韩国就照样有高考，而且更加“残酷”。去年暑假我到汉城大学去交流，听他们的学生说，为了考一个好大学，每天只能睡五个钟头，在这所韩国最好的国立大学里边，寒门子弟占到 70% 以上的比例，因为只有他们能够吃苦。所以每当看到有人说高考制度多么多么万恶的时候，我就想说：兄弟你打住吧，咱们就指望着在考场上证明自己呢。邱吉尔有句名言，说民主绝对不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它只不过是最不坏的。高考恐怕也可以套用这个评价。总而言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高考制度不仅不能废，而且要加强——

我的意思是说要使它更加公平合理更加铁面无私。比方说北京比湖北的分数线低个百把分，比方说考场舞弊录取时玩猫腻，凡是破坏高考公正的事情就一定要消灭——不过这些东西都已经不在本文范围之内，诸位有兴趣读我文章的中学生朋友想来也暂时无力改变现状，所以即使感觉再委屈也请努力调整心态，别因为憋气而浪费了自己可以争取到的机会。接下来是本词典的正文。

## 瘟科生

在我们荆都中学，文科生是被称作“瘟科生”的。“瘟”这个字在荆都方言里的意思就是“蠢笨”、“朽木不可雕”也，约等于那个著名的京骂“SB”。几乎所有选择读文科的学生都是因为数理化实在没有办法得到两位数以上的考分，而且即使如此这些人还是想方设法要赖在理科班，因为理科班据说是上大学的保险箱，文科班则被称作垃圾桶。到高二分科的时候，各个班的老师都想尽了办法要动员排名前十（倒数）的同志们赶快去“发瘟”，而教文科的老师脸总是阴沉沉的，但是不敢发作，最多背后找到学生说，“我觉得你很适合学文科的，你不是喜欢写诗吗？”“对不起老师我还有很多数学题要做。”

我想这就是这个曾经盛产诗人的城市只剩下水泥森林的原因所在。

## 我

很不好意思，我也是一个瘟科生。当然我自认为我理科还不错尤其在化学方面简直就是天才。整个高中阶段我的床头都放着《福尔摩斯探案集》（据钱钟书先生讲看侦探小说可以“养脑子”）福尔摩斯是我心目中最崇高最完美的偶像——我想假如诸位读过这个书一定不会忘记侦探先生是把化学试验作为业余爱好的。我当时的想法是自己配制王水，然后把金银（假如我能够买得起的话）铜铁锡熔解进去，再然后想办法把这些金属析出来，或许它们会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超级无敌的新材料。

可我的物理很不好，原因可能是我比较习惯于在分子而不是原子层面认识世界，也可能是因为我对牛顿力学产生的可怕的怀疑——比方说“质量”这个概念，我就觉得完全是虚构的，后来我一看到什么滑轮杠杆电阻，大脑就不可避免地死机。再加上我遇到了两个对我影响很大的教文科的老师（参见“永福老师”和“古哥”），所以我也就留在文科班了。直到现在我的父亲还不太高兴，他说本来你可以当一个工程师的，现在你学这个国际政治有什么用，你长得瘦骨伶仃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我们中国还有几千万人需要解决温饱问题，所以就算外交部要你你也不好意思去啊。

## 永福老师

给我很大影响的两个老师之一叫陶永福，班主任，当时

四十来岁。他以前在一个乡镇中学当校长，据说是很有点官威的，经常在大会上拍桌子骂娘，把底下的老师骂得大气都不敢出。后来削尖了脑壳调进市里，官自然没得做了，而且又摸不清“省重点”的水到底有多深，自己心理上先矮了三分，于是看到个年级主任就笑得奴颜婢膝，在校长面前更是温顺得像一堆橡皮泥。但以前的好多习惯就是改不掉，比方说我们班上出了个芝麻大的事，他肯定要阴着脸在讲台上站半天，然后一挥手，再狠狠地往下一砍：“班委会的全体干部留下来开会，哼，这个班风不整不行了！”

他还有很多经典的语言。有一回一个同学调皮，上自习课捣乱，恰好被他抓住，他把那个学生拖到讲台上，指着他说：“你——你破坏同学们的自习，你——你狼子野心何其毒也！”我们脸上也装出一本正经义愤填膺的样子，肚子里却笑得不行。他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在班上搞各种各样的“运动”，高一上学期叫“树理想养习惯”，下学期叫“比学赶帮超”，高二搞了“查缺补漏”“挑战自我”，高三则是“苦战大战三百天”，隔两天就有一个新口号。

当然，尽管思想土了一点，永福老师教书还是顶呱呱的。他本来就是正儿八经的荆都大学中文系八一届毕业生，在学校里边还曾经出过风头，并因此导致分配时吃了亏没有留城，但在乡下十多年都没有把教学丢了。我现在还记得他摇头晃脑得意洋洋地给我们念“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的情形。其实永福老师这样的人哪里像当官的？人家当官是越当越精，他除了学会一套酸不拉叽的“官话”以外，骨子里也还就是一个可怜巴巴的教书匠！所以学生虽然背后都笑话他，乱开他的玩笑，但是基本上还都是服他的。那一年高考我们班的

语文成绩就比其他班高一大截，而且一多半的学生报志愿都报了已经不再吃香的中文系。

锣鼓打鼓把我们送毕业，紧接着又出了一本书，当了市语文教研学会的常务理事，永福老师在学校里开始红起来了，原先那个校长正眼都不看他一下，现在居然主动和他打招呼，有一回上级来视察，校长还专门把他叫去向领导汇报。过后在酒桌上，喝得红光满面的校长笑咪咪地对他说，“永福老师不错……永福不错”，一边说一边把他的手牵过来，轻轻地拍着，好像是在拍着红玫瑰酒吧里娇滴滴的小姐，把永福老师搞得又是害羞，又是幸福。好歹他也是当过干部的人，但这样的气氛却前所未有地让他迷醉。

永福老师红了以后，慕名要进他的班的人就多了起来。每到新学期开始前一两周，校长、主任手头就有了一大把的条子，他自己也攥着一把条子。条子意味着什么？条子就是关系，条子就是权力，能够写条子是本事，能够接条子也是本事——永福老师幸福地想。

还有更让他兴奋的事，上头说要改革教育管理体制，准备公选一名副校长。这可把他几年里压抑下来的雄心壮志给点燃了，激动得觉也睡不着，满脑壳都是“竞选演说”。逢人就热情地上去寒暄，有事没事都往校长主任家里跑，但跑着跑着他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原来主任也盯着这个位置呢。旁边的老师都提醒他，说这回主任要上，上边都打了招呼的，永福老师愣了愣，但想起校长那笑咪咪的眼神，想起自己在教学研讨会上的滔滔不绝，想起自己的班破了全市高考纪录时在电视上接受采访的样子，感觉又一下子好起来。“公选嘛，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动员大会上教育局长一

挥手，再狠狠地往下一砍，就是这么讲的。

公选那天永福老师穿得很正式，讲得也很正式，台下的掌声也稀里哗啦一直不断，但是他看到局长和校长脸上都阴沉沉的，掌声越响脸色就越不好看。他下台以后跑去和校长握手，校长冷冷地只给了他半个脸，另外半个脸对着局长说：“永福老师不错……永福老师讲得不错。那语气似乎是在夸他陶永福，但又分明透了杀机：你——就凭你也想上？你，你——你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票投下来以后并没有当场公布，而不久就传来消息：永福老师的材料没有过组织考察关，据说和他大学分配时吃的那个亏还有联系，有人到处揭他的“老底”。主任则顺理成章上去了，不过到底是领导干部有水平有涵养，尽管很快就根据“工作需要”把永福老师从高中部调到了初中部，但每次见到他时都主动地热情地伸过手去，“永福老师那天讲得不错……哈 不错！”

## 古 哥

第二个老师姓古，他在高一时开始教我历史。那时他刚从荆都大学毕业不久，很瘦，留板寸头，穿颜色有些夸张的夹克，说话带着一点外地口音，但是非常有味道。一上来他就给我们侃诺查丹玛斯的预言和金庸笔下“食菜事魔”的明教，让我们如痴如醉。很快我就和他混熟了，可以拍着他的肩头叫他“古哥”。在他那狭小阴暗的房间里我最留心的是那满满一架的书。每一本书都被翻得皱皱巴巴，每一页上都如鬼画桃符般批满了字儿。我不曾也无法细看他都写了些什

么东西，但那张牙舞爪的字迹分明让人感觉到元气淋漓。

古哥的妻子，是他大学的同学，但是却分配到了一个偏远的乡村中学（古哥能进我们的这所“省重点”靠的是他惊人的好成绩，他没有别的路子）。古哥曾去找过校长，理所当然，他被笑呵呵地送出了门。从此他也就绝口不提了。

尽管有种种不如意，古哥也从来没有让我发现过他有什么忧愁。他的话题永远那么新鲜有趣，他总是在课堂上和学生一起哄堂大笑，他常在深夜里不知疲倦地写东西（他钻过一段时间古文字，也搞过古代兵制史）。有一次期末考试他出了一套既偏又怪的题，结果全年级只有十个人及格，我是其中之一，而且拿了 80 分，为此他在试卷上写了四个字：罕见奇才。全班都轰动了，我装着无所谓，但在心里却翻江倒海般地兴奋，这个事件直接导致我成为瘟科生。

高三很快就到了，我和古哥之间的友谊也越来越深。我甚至相信我可以从他眼里读出他所有的心事。然而，突然就有消息说古哥将要调走——到市政府。我不假思索地否定了这种说法，因为他不可能有了这么大的事儿而不漏一点口风，而且我根本不信古哥这样的人还可以到官场上混，他说话太多太快，他狂，他太聪明，他有无穷无尽的生命力，他不会谄媚，他不会驯服……

然而这个消息终于还是被证实了。古哥早就被本市的一位副市长看中，要他去做秘书。他犹豫了很久，但是为了妻子的调动，他答应了。

后来的故事可以想像。我们流着眼泪试图挽留，但同时我们也发觉自己不能太自私，不能再让他和师母分离，再加上高三的沉重压力，使得我们没有工夫伤感。古哥也很伤心，

但他很快就开始夹着公文包到政府大楼上班。他换了发型，穿上了西服，而且我们也常常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他跟在他的“老板（如今似乎管当官的都叫“老板”）后边出入大会小会，他的精神很好。

再后来我就如愿以偿考到了那所刚刚过完百岁生日的大学。当我打电话给他时，听筒里传来了他激动的声音：“我已经知道了……太好了，好好庆祝一下……努力呀，那里也是我的梦想呀！”听到这些话我哭了，我想起了和古哥一起在操场上高唱“沧海一声笑”的日子。

但是古哥终究是不会再和我一起放肆的了。当大学第一个寒假我回家去看他时，我发现他开始发胖，肚子竟然微微腆了起来。他依然健谈，他告诉我某老板去香港时出了多少洋相，告诉我校长现在如何来讨好他，告诉我政府大楼里的“经典”笑话……我给他买了李学勤先生、裘锡圭先生的书，但他并没有像我想像中那么高兴。他让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距离。

第二年春节我仍然去了古哥家，他这时搬了新居，房子不大但是亮堂多了。我发现再也不可能叫他“古哥”了，于是我叫“老师”——但看得出他并不想被叫作“老师”。在这个城市里 任何人 包括引车贩浆修电灯泡的都可以叫“老师”。真正的尊称是“老板”。而且我发现已经有人管古哥叫“老板”了。

我还送了一把折扇给他，上边请我的一位朋友写了“功名本是真儒事”七个字。这是辛稼轩的句子。

第三个春节又来到了。我已经决定不再去打扰古哥。听说他混得很好，他的“老板”升到了市委书记的位置，那么

他也应该升了吧。可是到除夕夜里，我还是忍不住拨通了他家的电话，准备拜个年。接电话的是师母，她告诉我古哥不在！然后她有点怨愤地诉说起古哥：常常不回家，脾气越来越大，酒越喝越凶。最后她又问我要不要书，他们很快要搬到“处长楼”了，古哥的一架子书都可以给我……

## 复读生

前面两个词条都已经扯到了我的大学时代，下面再扯回来。因为复读生上线的把握比较大，可以提高学校的升学率，所以我们荆都中学每年都要收很多的复读生，甚至免去他们的学费。我高三的时候教室和复读班挨在一起，于是每天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场景——课桌上堆满了各种各样就像海带一样皱巴巴的复习资料，每个人都埋着头在那里使劲地写啊写的，要不然就握着笔盯着窗户发呆，实际上他们看不到窗外的风景，因为学校在玻璃的下半部涂了红色的油漆。日久天长，我发现很多复读生的眼睛都是红色的了。

我知道所有的复读生都非常的苦，主要是心里边苦。据说我们学校有一个女生一共考了六次，后来又据说有一个农村来的男生打破了她的纪录，想不出来他们是怎样熬过那些日子怎样面对那种压力的，想起他们这样的生活我就害怕并且想哭。我的一个朋友后来复读了一年，他写信给我说，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他都要做噩梦，有时候梦见自己上了考场却找不到笔，有时候梦见和老师打架，还有时候梦见自己头上长了角。

## 两个朋友

我在高中有两个特别好的朋友，其中冬瓜是个写东西的天才——可惜当时韩寒这块“上海大金子”还不知道在哪里被埋没着，否则他肯定要引冬瓜为同道。我们当时不在一个班，语文老师也就不是一个人，所以我的周记基本上都是从他那里抄过来的，而这些作品总是可以得到永福老师毫不吝惜的好评。

但是冬瓜的数学特别的差——这几乎是一切文史天才的共性，想当初吴晗考清华语文历史得满分，数学得零分，钱钟书则得到了 15 分，不过他们运气好，照样有人赏识他们录取他们。冬瓜其实也学得特别卖力，可找家教恶补多次后也没有什么起色。我当时就跟他说数学也可以死记硬背的，其实数学课本可以分解成两百个知识点，每个知识点可以有三种左右的应用题型，只要你每天记住一些最后考试就没有问题了——我的这个理论要是让华罗庚陈景润他们听见了估计得被活活气死，可是没有办法我们就是这样学数学的，我才不管什么思维方法逻辑体系呢。当然见效快忘得更快，到大二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经不会解二元一次方程了，这个发现说明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的所有数学课我都如数还给老师，弱水三千，一瓢不饮。

靠了我的秘诀，冬瓜后来上了荆都师范大学。据说他现在正在写一本关于大学生活的小说，而且他模仿的对象是王跃文的《官场春秋》

还有一个朋友叫露露，当然这是个男生——顺便说一句，

我们那时候和女生之间的交往其实非常多，也非常随便。尤其高考完了大家一起喝酒的时候，那个亲热劲，现在想起来都有点肉麻——谁叫我们是一起把教室坐穿的“难友”呢。

露露的大哥比我们高一届，但是发挥得不好落榜了，所以又复读。这个事情对露露影响很大，导致他对高考产生了超乎寻常的畏惧，复习的时候愈发卖命。后来高考三天他天天失眠，考完就进医院了，不过还好，分数不是太差。所以看来假如你经常学通宵习惯了疲劳作战也是有好处的。

我们三个在一起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玩的，主要的活动就是晚上出去走路。当时只有每周六的晚上不用上晚自习，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一起漫无目的地往郊外走，有些时候我们会说很多话，讨论很多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有时候我们又莫名其妙地一句话也不说，光是埋着头走，一直走到没有路再回头。

现在我很怀念那种走路的感觉，有一点点像魏晋名士。我想那种心境可能是很接近的，他们需要发泄，我们也需要。

## 中城街书店

高考前我和我的朋友发展了一些据点，中城街书店就是其中一个。这是一个特别破旧的国营书店，几乎没有什么好书，营业员是个老太婆，态度不好对人爱理不理的，但就是因为她对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爱理不理的态度，才使我们可以经常泡在书店里发呆，她绝对没有兴趣和力气把我们赶走。

我特别惊讶自己当时对于无聊文字的忍耐力，我几乎把一大套《荆都地方志》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尤其是什么行业

志，特别枯燥，但是我就是能看下去，最后甚至连《果树栽培技巧》之类的书也没有放过。这种感觉我想你也是可以体会的，人越是压力大，就越会表现得无聊和白痴。另外还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时基本上放弃了用大脑来探索高层次的智慧，已经有一点迟钝了。

### “一诊”二诊” “三诊”

在荆都本地又称为“一摸”“二摸”“三摸”——摸底考试——当时看过《鹿鼎记》的学生都问是不是一共要考“十八摸”。不过我觉得“诊断考试”这个名字更有意思，通过这三次“诊断”我当然没有治好任何病，反而留下了一个怪病：习惯性胃痉挛。每次大的考试我都吃不下东西，一吃就吐，到高考的时候没有办法，只好注射葡萄糖。

### “二十八套”黄冈中学

“二十八套”是一本模拟题集的简称，包括北京海淀区、东北师大附中等地的“一诊”“二诊”试题，上面的每一道题都被我们当作经书上的话来反复讨论，先注后疏直到笺证。其中最难的当属黄冈中学，永福老师跟我们讲，那里的条件还不如荆都，可是人家多么多么能吃苦，所以每年能有几十个学生考上北大清华，有几十个学生参加国际奥林匹克学科比赛，那里每到高考前学生要写血书老师要立军令状……总之黄冈就是我们高考的圣地。

后来我上大学，不巧寝室里就住了一个黄冈的哥们儿，

问他黄中真有那么凶险吗，他说多半是瞎传，他反正是浑浑噩噩玩过来的，每天晚上都翻墙出去喝酒看球。我们还没听完就开始打他，敢情你们都玩却编些卷子出来祸害我们啊！

## 保送

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情况怎么样，我们荆都中学搞保送是有文章的。1998年年初的时候突然宣布一个政策，说保送全部取消，我心里还暗暗高兴了一阵，有本事大家考场上见，谁也别想走捷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保送仍然继续，结果搞出了很多恶心的事情。最后官家的孩子都保送了，大家都是不服气的。我虽然也觉得可恨，但是并没怎么往心里去，从小到大，这种事情看得多了，麻木了，又没有本事改变这种游戏规则，总不能回去怨爸爸妈妈不争气只能当工人吧。现在想想觉得有点可怕，不知道我为什么在这些事情上这样早熟。

古哥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只有官才怕官，我们读书的人不怕官”，我一直把这个话当作座右铭，我不贪图别人的恩荫，也决不在权势下失掉了气节，只愿老老实实读书，做一个堂堂正正的读书人。

## 嚎叫

前边提到我排遣压力的方式之一是走路（见“两个朋友”）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嚎叫。比如晚自习如果突然停电，我就会大声地嚎叫，然后其他同学也开始嚎，甚至也有

女同学加入。这个时候老师可能点着蜡烛在门口盯着我们，但是我从来不害怕被他看到。

突然停电的机会还是不多，主要还是放学后在操场上，望着黑沉沉的天幕大喊。

其实嚎叫这个词也可以说得雅致一点，比如“清啸”。这也是魏晋名士的做派，胸中有不平之气，自然要声鸣于野。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下我们会集体嚎叫，就是老师宣布要收钱的时候。高三的时候运费那费交个不歇，反正只要老师一开口，我们就大叫表示抗议。他气得不行，说又不是我要你们的钱是上面布置的你们冲我闹什么。其实想想老师也蛮可怜的，可是我们当时就像一群野人一样。

## *P大校庆*

这个事件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98年我高考前的几个月，正是P大百年校庆最热闹的时候。从“校友专列”到纪念邮票，从静园草坪上的晚会到人民大会堂的庆典，真让我这个还远在两千公里以外的中学生激动不已，潜意识里简直已经把自己算作了P大的一分子。当时惟一感到不解的是中央电视台直播的“光明行”晚会，把郭富城请来又唱又跳，台下的P大学子似乎还兴奋得不得了，我就想，怎么P大的学生也“追星”？这个“靓仔”和“爱国民主科学进步”的“百年传统”有什么关系？

P大校庆带给我的还有两本书，一本是《P大旧事》由一对声名显赫的学者夫妇编辑，主要关注的是P大在1949年以前的趣闻轶事；一本是《P大往事》编者是一个曾经落

魄现在和书商打得火热的前诗人，故事里的主人公生活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但是思想之乖谬行为之放诞与他们的先辈并无二致。看完这两本书我对 P 大的感觉好得不得了 同时觉得假如 P 大不要我它的绝代风华如何延续呢。后来真进了 P 大我才发现，其实高中时候的印象不过是别人或者自己造出的神话。大学，哪怕 P 大，也不可能在如此的世风和时风之下独善其身，堕落媚俗甚至无耻都是存在的。

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也是悲剧。当时我是铁了心要考历史系的，但是诸位都知道，坐冷板凳吃冷猪肉的学问如今是没有任何地位的。P 大的历史系自己也知趣，所以每年只招很少的学生，而在我们省根本就没有名额。于是我只好另报了一个名头很吓人的国际政治系，并且到现在为止已经呆了四年，可抱歉得很，我至今不知道我们这个国际政治讲的是些什么。

## 补脑液

每到高三下学期的时候各种补脑液就开始拼命做广告，常见的是一个穿着博士服的小帅哥——头上有光环，背景是北大的西校门或者清华的二校门——拿着一个瓶子，然后大喊“x x x 真管用”我要 x x x”。自然我是绝对不会相信这些东西的，但是最后我却不得不每天喝，因为广告征服了我妈妈。我实在想不通平时精打细算的她为什么会不顾我的强烈反对把大把大把的票子送给那些奸商。

## 毕业照

我高中的毕业照已经搞丢了，这和我对照相的不感兴趣有关。前几天上 CHINAREN 的校友录，才又看到别人扫描上去的照片。那个时候我简直瘦得脱形了，两个眼睛都陷了下去。本来我以为自己高三过得挺轻松的，但是这个照片使我明白其实自己也是饱受摧残。

毕业照上面还有一个同学的位置是空着的，“一诊”以后他的精神就出了问题，整天脸色苍白，说有人要抢他的卷子。于是只好回家去休息了，听说还没有好过来。我一直没有去看过他，因为我知道，他可能希望忘记我们，更希望我们也忘记他。

## 温书假

高考前的温书假是我这辈子（到目前为止）觉得最受煎熬的一段日子，古龙说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等死，温书假就相当于等着宣判，那种烦躁、焦虑，不堪回首。现在回忆起来那几天我主要就是在发呆，发呆发到头晕脑涨。

## 《我选择了坚强》

这是我们那一年高考的作文题目，我当时一看就乐了，不就是要我表决心献忠心展现雄心吗，轻车熟路。于是我开始编造我高考前是如何患上重病气息奄奄日暮途穷又如何